# 一了百了——为什么资本税不是解决办法

2013 年 11 月 6 日

作者：Michael Keen

**Michael Keen**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副主任。他此前是财政事务部税收政策和税收协调处的处长。在加入基金组织之前，他曾任埃塞克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和京都大学访问教授。他曾带领技术援助小组访问了近三十个国家，处理各类税收政策问题，并为世界银行、欧盟委员会和私人部门提供咨询。他曾任美国国家税收学会理事，《美国经济杂志：国际税收和公共财政》（他是联合创立人）、《公共经济学杂志》、《经济研究评论》和许多其他杂志的编辑委员会的委员。他是《现代增值税》、《石油和矿产征税》和《变化中的关税》等书的合著者。

**“圣杯”**

昨天夜里，你在上床睡觉前，把 40 美元放在了厨房桌子上。今天早晨你醒来后，发现只剩下 30 美元，还有一张政府的字条，上面写着：“非常感谢，我们拿走了 10 美元，这是你要交的税。”这当然很令人恼火。但对经济学家来说，这接近理想形式的征税，因为你现在没法减少、避免或逃避这种缴税义务——经济学家将非扭曲性税收称为“圣杯”。

（这并不意味着你不会做出某种形式的反应。你的境况变差了，那么你可能会多工作一些，或少存一些钱。但如果再向你征 1 美元的税，会使你的境况变得更差，因为它会改变相对价格（例如，对你的收入征税会使工作的吸引力下降），所以会使你的决定更加偏离在不缴税的情况下你会作出的决定。）

上面所描述的就是“资本税”的本质所在。最近一期《财政监测报告》的专栏 6 讨论了这一问题，并引起了很多关注。（要明确的一点是，基金组织并没有提出这种建议；该专栏只是对有关问题和经验进行分析性描述，而这些问题和经验其实早就是公共讨论的主题了。）这种税收是对资本的一次性征税，具体的税基有待确定，但一般来说肯定要大于放在厨房桌上的钱。除了这种税收的效率优势外，许多人还认为这种税收有利于公平，因为拥有资产最多的人自然要承担最重的税负。

所以，毫不奇怪，征收资本税的想法时不时地成为公共辩论的热点问题，特别是在各次战争之后。各国在战后力图通过非常规措施减少高额债务——有战胜国（拿破仑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），也有战败国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）。但是，正如伯克利的经济学家 Barry Eichengreen 所作评论明确指出的，政府很少实施资本税，在这方面也几乎从未成功过。其中有明确的原因。

**“放了毒药的圣杯”？**

上述用家里所作的类比也显示了资本税的根本缺陷。今天晚上，你担心政府还会那么做，于是决定不在桌上放任何钱，或者，你可能会把钱花掉。仔细看看政府留在桌上的字条，你发现上面写着：“另，我们保证不会再这样做。”

但是你相信吗？如果政府再次陷入麻烦，会怎样？现在，你很可能会设法减少、避免或逃避今后可能要承担的这种缴税义务——这种税可能变得具有严重扭曲性。

简言之，若想不扭曲，这种税必须是意料之外的，并且人们确信今后不会再发生。这两点都很难做到。

设立和实施任何新的税都需要时间，政府很难完全保密地采取行动（暂且还不考虑透明度问题）。所以，资产所有者就有时间把资产转移到境外，消耗掉，或隐藏起来。未来会征税的这种可能性造成的破坏可能更大；这种征税会抑制储蓄和投资，从而不利于创造未来的资本性资产。更一般而言，这类意料之外的税收会损害所有政府税收政策的可信性。如果政府今天能这样做，谁能保证他们今后不会采取别的措施，比如，突然决定过去投资的折旧和旧有贷款的利息不再免税？

为有效征税，必须保证人们对未来税收政策有一定程度的信心，这种信心要超越政府征税能力可能面临的任何法律限制。所以，问题并不在于，实践中，任何资本税都将是扭曲的，而在于，资本税很可能非常扭曲。

各国在征收资本税方面的经历能够说明这一点。那些曾实施了资本税的国家很少能够通过资本税取得大量收入，并且，之前还要耗费大量时间进行公共辩论，另外还会出现资本外逃（伴随出现的通货膨胀侵蚀了债务）。Eichengreen 只发现了一个成功的例子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。在二战后的日本，资本税是由占领势力征收的，所以基本不受民主标准的限制，也不会损害未来政府的信誉。这是一个例外——显然不能作为参照。

**各种财富税**

资本税是一种形式的财富税。不应将其与对财富及其转移征收的许多其他形式的税收混淆起来（有时会出现这种混淆）。这些其他形式的税包括：对死者留下的不动产征收的税，对遗产和赠与征收的税，对不动产征收的税，对资本性资产征收的税，等等。这些税的经济学原理非常不同，有些情况下，可行性要好得多。我们在《财政监测报告》中也讨论了这一问题，以后我将专门针对它写一篇博客。